

論文

吳濁流小說〈先生媽〉的根土文化意識

施又文*

摘要

吳濁流小說〈先生媽〉，藉由台灣作家在日治時期的母親書寫，表現作者對於台灣文化、傳統和語言的認同。

小說以先生媽和兒子錢新發的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對立衝突做為主軸而發展情節，先生媽認同台灣文化、語言，重視傳統，悲憫鄉鄰，一則受到了中華儒教文化的影響，更多的是先生媽的台灣主體意識與在地文化的認同身分。

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先生媽死後，跟從皇民意識的錢新發，也等於與根本文化脫離了聯繫，原有的文化與主體意識也就跟著消失了。

關鍵詞：吳濁流、先生媽、文化、台灣、主體性

一、前言

吳濁流小說〈先生媽〉是一篇以台灣日治時代皇民化運動為歷史背景的母親書寫，1944 年 4 月發表於《民報》，¹它描寫日治時代台灣醫生錢新發對日本統治者諂媚逢迎，成為日本統治者的御用工具；相反的，錢新發的母親先生媽卻不喜歡跟從日本的一切，更不屑當時所謂的皇民化運動，她堅持傳統、愛好根土，最後鬱鬱而終。

過去傳統的女性在「男尊女卑」²與「三從四德」³的規範下，經常是男性

*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¹ 見盧欣怡，《吳濁流小說中的臺灣社會》（臺北市：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附錄一：吳濁流簡要年表。

² 《周易·繫辭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漢〕班昭《女誡·夫婦》：「夫有再娶之義，婦夫二適之父，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違也，……故事夫如妻天，與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列子·天瑞》：「男女之別，男尊女卑。」

³ 《周禮·天官冢宰第一》說：「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九嬪」、「九御」均為宮內女官。班昭的《女誡·夫婦》對「四德」有詳細解釋：「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

的從屬物。小說中的「先生媽」卻未受到「夫死從子」的禮教信條所束縛，也沒有因為在經濟上需要依附兒子就壓抑自己的信念，她堅持對日本文化的抵抗至死不渝，這似乎有異於常情常理。

余昭玟〈論台灣現代小說中的女強人〉一文說：「衡諸台灣歷史，在被殖民與再殖民的架構裡，台灣正如同一個失去父權的男人，陽剛的父性轉變成禁忌符號。」⁴因此，在台灣日治時代的「母親」書寫，是形構當時文化、語言、社會、台灣主體性與身分認同的核心指標。⁵如果把吳濁流對「先生媽」的書寫，視為作者處於國家被殖民宰制下對於台灣文化、傳統與語言的認同，而非對於個別女性形象的突顯，⁶毋寧更為貼切。

本論文在簡單介紹〈先生媽〉這篇小說的大致內容後，擬從性情、語言、姓氏、風俗、習慣等各方面，比較〈先生媽〉的台灣根土文化意識與從俗者的皇民意識。

二、〈先生媽〉內容介紹

(一)時代背景

〈先生媽〉全文約 7400 字，以台灣日治時代皇民化運動為歷史背景，描寫先生媽與兒子的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對立、衝突。

皇民化運動起源於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希望其統治下的本國少數民族以及殖民地族群，認同日本與日本天皇，同化為完全的日本人，以便動員殖民地人民參加其戰時工作，台灣即其「皇民國化」的對象之一。1936 年 9 月第 17 任台灣總督小林躋造提出統治台灣三原則：「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皇民化運動於焉展開。

⁷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同時，第 18 任台灣總督長谷川清推行「皇民奉公運

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

⁴ 余昭玟，〈從鍾肇政到葉石濤〉(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2013 年)，頁 186。

⁵ 曾麗玉，〈文化之認同與抵抗美學：以〈水滸〉、〈奔流〉、〈先生媽〉「母親」作為隱喻書寫為例〉，《中華科技大學學報》，71 期(2017 年 7 月)，頁 20。

⁶ 張毅對「先生媽」的解讀，即是從女性形象與女性人格價值出發，見〈雙性同體視角下吳濁流小說中的女性形象研究〉，《閩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 104 期(2017 年 1 月)。

⁷ 「皇民化運動」，維基百科網頁，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6%B0%91%E5%8C%96%E9%81%8B%>

動」，將運動推向社會的最基層，目的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驅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

〈先生媽〉即以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做為小說的背景，特別著墨在 1936 年底到 1945 年的皇民化運動時期的台灣社會。皇民化運動的大致內容如下：⁸

1.國語運動

日本希望所有台灣人在公、私領域都能講日語，獎勵「國語家庭」。1937 年 4 月以後，台灣總督府禁用漢文，全面停止報紙漢文版，師範學校也不再教授漢文課程。1943 年，台灣人有 80% 已經有使用日本語的能力了。

2.改姓名運動

由戶長提出申請全家人更改成日本姓名，採許可制。該家庭必須是「國語家庭」，並且具有皇國國民的基本素質，以「良民」、「公務員」身分等條件優先考慮。1943 年底，全台灣約 2% 人口改為日本姓名，以公務人員與社會菁英為主。

3.生活型態日本化

提倡台灣人穿和服，住日本房子，學習日本茶道、花道、禮儀與歌謠。

4.宗教日本化

主張日本神道教為台灣的信仰主流，廣建神社令台灣人參拜，每日也要朝日本天皇的居所方向膜拜。

5.志願兵制度

由於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日本內地兵員匱乏，日本當局於是在 1942 年開始在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943 年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並於 1945 年全面實施徵兵制，役齡青年全被徵召入伍。上戰場替軍隊勞動的人，他的家宅可貼上「榮譽之家」字樣。

日本對於實踐皇民化運動的台灣人給予多項獎勵：諸如「國語家庭」與「榮

E5%8B%95 查閱日期：2019.1.10.

⁸ 以下「皇民化運動」資料，係參考三種文獻重新整理：「皇民化運動」，維基百科網頁，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6%B0%91%E5%8C%96%E9%81%8B%E5%8B%95> 查閱時間：2019.1.10. 李筱峰、林呈蓉編著，《台灣史》（土城市：華立圖書公司，2007 年）。陳儀深，《台灣的社會：從移民社會、多元文化到土地認同》（淡水鎮：群策會李登輝學校，2004 年）。

譽之家」的子弟，升學競爭上較佔優勢；而「國語家庭」的成員，公家機關得以優先任用，在機關內較有機會升遷，食物的配給較一般台灣家庭多等等。

皇民化運動漸趨白熱化時，日本政府大量起用御用紳士，〈先生媽〉小說中的公醫錢新發即此一類型人物的代表，他加入使用日本語的家庭，改換日本姓名，學習日本的一切，目的在得到日本當局的肯定與好處。

(二)故事大要

小說藉由「先生媽」與「錢新發」，做為日治時期堅持台灣本土語言文化與屈從日本語言文化的兩種意識形態的對比象徵。

先生媽是錢新發醫生的母親，為人樂善好施，是個直腸子的熱心好人，每個月十五一定會施捨乞丐糧食或金錢。相較於吝嗇又愛面子的錢新發，先生媽總是斥責他不願付出的個性。

錢新發自小因為貧苦備受嘲笑，養成他後來愛錢愛面子的個性。他對貧困下層的鄉人吝嗇輕視，卻對郡守或課長千金款待。不單如此，他還率先奉行皇民化運動，推行日本語家庭，改了日本姓名、學習日本的一切，然而這一切的隨波逐流，只不過想得到日本人的肯定。

先生媽卻不喜歡學習日本的一切，更不屑當時所謂皇民化運動，她只堅持台灣傳統的一切，不願接受任何改變，到最後鬱鬱而終。

三、「先生媽」所代表的台灣主體性與根土文化意識

1895 年清朝政府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條文中要求台灣人民須在兩年內(1897 年年底)選擇要留在台灣或遷回中國，產業也可以聽任變賣處理，結果留下來台灣的約有 99.77%，這種現象說明了絕大部分的台灣人民已經根植於台灣，他們的父母妻子田廬家產，乃至生存條件與空間，都很難脫離台灣了。⁹

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由典型的「移民社會」轉向「定著社會」，過去的祖籍關係或認同，漸漸轉向為地緣的關係或認同，閩粵之分變成為關於對本地的文化語言或對台灣歷史經驗的認同，這不一定與祖籍地的中國原鄉有直接關連，日治時期遂由福佬人或客家人的關係，取代了原來的泉州、漳州或廣東的客家人、潮州人的關係，在台的福佬人、客家人，不同於中國的閩粵人、南洋的福建或廣東移民後裔。¹⁰

⁹ 李筱峰、林呈蓉編著，《台灣史》(土城市：華立圖書公司，2007 年)，頁 167。

¹⁰ 陳儀深，《台灣的社會：從移民社會、多元文化到土地認同》(台北市：群策會李登輝

由於這種地緣與鄉土的關連，加深了台灣人對台灣主體性與根土文化的認同，曾麗玉認為這種「人民與土地的密切性，是台灣主體意識發展，與自我文化身分認同的根基。」¹¹這樣的觀點與范振乾的看法「在台灣人的認知裡，台灣是台灣人用自己的力量所開拓的，……他(吳濁流)的認知裡，……與其說是一種漢民族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不如說是一種所有權的概念更恰當，」不謀而合。¹²1895 年日本進入台灣伊始，台灣人民自動自發抵禦外敵，產生了共同的利害感，因此在吳濁流的作品裡，敘述日治時期的人與事，幾乎都是使用包含台灣各族群的全稱名詞「台灣人」，范振乾進而肯定地說：「吳濁流的台灣人意識是一個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的一種概念。」¹³這種主體意識，實際的源頭來自於台灣人與台灣這塊土地的密切性，台灣的語言與文化的共同性。

邱雅芳(2002)〈以母親之名--皇民化時期台灣男性作家作品的女性呈現〉一文指出，「日治時期的台灣男性作家大量運用『母親』形象傳達理想的台灣/女性，並擅常以『母親』正面或負面的形象來影射自我對台灣的愛戀或厭棄，以『母親』受難或堅毅的精神來影射台灣的困境。」¹⁴下面，筆者就從「母親」的形象來分析「先生媽」所代表的台灣主體性與根土文化意識。

(一)以道義對抗功利的鄉鄰觀念

先生媽出身貧苦，丈夫做過苦力、轎夫，她自己夜夜織帽幫助生計，對於弱勢鄉鄰的困挫感同身受，家庭經濟好轉後，先生媽或者施捨濟貧，或者敦親睦鄰，總之是出之於赤誠。她十年來每月十五日都施捨大米給老乞丐；她聽到老乞丐悲哀的聲音，就不由得同情起來。小說寫到「白髮蓬蓬，衣服襤褸補了又補」的老乞丐，走「到老太太跟前，馬上發出一種悲哀的聲音：『先生媽，大慈大悲！』」先生媽聽了憐憫起來，立刻將乞丐的米袋拿來交給丫頭，命令她：『米量二斗來。』」¹⁵後來糧食改成配給，先生媽仍然拿錢施捨給老乞丐，直到

學校，2004 年)，頁 31-32。

¹¹同註 5，頁 33。

¹²范振乾，〈論吳濁流作品中的台灣人意識〉，收入林柏燕主編，《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專刊》(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2000 年)，頁 3-5。

¹³同前註，頁 8。

¹⁴邱雅芳：〈以母親之名--皇民化時期台灣男性作家作品的女性呈現〉(1937- 1945)，《台灣文學學報》第三期(2002 年 12 月)，頁 229、232、233。

¹⁵本文所引〈先生媽〉原文，悉參照彭瑞金編，《吳濁流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1 年)，茲此說明，後文引用不再另注。

過世前依然如故。

先生媽的小孫子與剃頭店的兒子在學校發生衝突，當她知道起因係出於孫子罵對方：「下流十八等也改日本姓名」的緣故，當著家人的面對錢新發說：「從前的事，你們不知道，你的父親做過苦力，也做過轎夫，你罵剃頭是下流，轎夫是什麼東西哪？」這樣的話來，她告誡子弟不要忘本，不要勢利，更不要迷失自己。小說描寫先生媽以丈夫做過苦力、轎夫，告誡家人不可以輕視下等人；她又用老乞丐的手杖棒打不肯施捨濟貧的兒子錢新發，斥責兒子走狗成性。

先生媽的兒子錢新發是個吝嗇的公醫，由於出身貧苦、學生時代備受嘲笑，養成他愛財愛名的習性：「田租三千多石，一斗米也不肯施，看輕貧人。」為了得到名譽與地位，卻不惜捐款千金，「當地的名譽職，被他佔了大半。公醫、矯風會長、協議會員、父兄會長、其他種種名譽的公務上，沒有一處會漏掉他的姓名。所以他的行為，成為K街的推動力。」因此，當「剃頭的，補皮鞋的，吹笛賣藝的也改了日本姓名」，他感覺自己的仕紳身分被這些下層階級給玷污了！

簡言之，先生媽的施捨行與平等心，係出於敬鄉善鄰的道義；錢新發對於患者的親切好意、¹⁶對轎夫的體恤、¹⁷對名譽公務的捐款，終究不離乎自利的打算。

敬鄉善鄰的觀念在傳統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農業社會，生活必要依存於土地，敬愛自己生長和作息的鄉土，這不僅是對土地的依戀，同時也是寶愛自己生長的社會，由敬鄉更進而產生了善鄰的觀念。¹⁸

《論語·里仁第四》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第16則)又云：「君子懷德，小人懷土。」(第11則)《菜根譚》也說：「對憚獨而驚心」、「富貴家宜寬厚而反忌刻，是富貴而貧賤其行矣，如何能享？」因此，台灣人乃至

¹⁶〈先生媽〉描寫錢新發遇到：「病者來到，問長問短說閑話。這種閑話與病毫無關係，但是病者聽了也喜歡他的善言。老百姓到來，他就問耕種如何；商人到來，他就問商況怎麼樣；婦人到來，他就迎合女人的心理。……他用甜言商量，鄉下人聽見孩子的病厲害，又聽見這些甜言順耳的話，多麼高價的打針費，也情願傾囊照付。」

¹⁷〈先生媽〉描寫錢新發出診時：「對人無論童叟，一樣低頭敬禮；若坐轎，到了崎嶇的地方也不辭勞苦，下轎自走，這也博得轎夫和老百姓的好感。」

¹⁸錢穆，《中國文化論叢》，收入《錢賓四全集 44》(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95年)，頁185。

一切的中國人，其對於鄉鄰老吾老、幼吾幼的悲憫情懷，毋寧是受到儒教文化的影響。

儒教文化由台籍的先祖從祖籍地帶來，播種繁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因為農業與定著社會的緊密聯繫代代滋養台灣子民。人民與鄉土生死與共的情感加深了台灣人對台灣本土與文化身分的認同。下面，筆者接著探討「先生媽」以台灣本土語言文化對抗日本語言文化的台灣主體性意識。

(二)以台灣本土語言文化對抗日本語言文化的台灣主體性意識

筆者擬從擬從性情、語言、姓氏、風俗、習慣等各方面，梳理「先生媽」的台灣根土文化意識。

1.性情及語言姓氏

錢新發一家是「國語家庭」，全家都禁止使用台灣話。錢的母親先生媽卻完全不懂日本話，也不願學習日本話，更有意思的是，先生媽非常好客，小說寫到她「見客到來，一定要出來客廳應酬。身穿台灣衫褲，滿口說出台灣話，聲又大，音又高，全是鄉下人的樣子。不論是郡守來或是街長來，也不客氣。」曾麗玉認為，這是「以台灣母語作為台灣主體性的一種表徵，從台灣鄉土母親的視境發聲。」¹⁹

錢新發已被列為日本語家庭，而對此感到無上光榮，接著又申請改日本姓名為金井新助，並且掛起新的門牌，同時家族開始了穿和服的生活，連他年久愛用的公醫服也丟開不問。同時又建築純日本式的房子。等到房子落成時，他喜歡極了，要照相作紀念。他又想要母親穿和服，奈何先生媽始終不肯穿，仍然穿了台灣服拍照。先生媽拍照後，卻將當時準備好的和服用菜刀砍斷切碎。旁人嚇得大驚，以為先生媽發了狂了。但是先生媽卻有自己的看法，她說：「留著這樣的東西，我死的時候，恐怕有人給我穿上了，若是穿上這樣的東西，我也沒有面子去見祖宗。」傍人纔了解先生媽的心事，也為她的直腸子感動了。可以見得先生媽尊重傳統、真誠善良的個性。

2.風俗與習慣

除上所述，先生媽還過不慣日本式的家常生活，比如吃早餐的「味噌汁」，在榻榻米上坐著吃飯，在日式的房間掛蚊帳，小說寫道先生媽「頑固得很，錢

¹⁹同註 5，頁 30。

新發怎樣憔悴，怎麼侷促，也難改變他母親的性情。若要強行，一定受他母親打罵。」即使病勢加重，去世之前，先生媽仍然念念不忘油條的滋味：「先生媽想起在貧苦時代吃的油條的香味，再想吃一次，叫新助買，他又不買，因為新助是日本語家庭，吃味噌汁，不吃油條的。……，乞丐買了油條，偷偷送來。先生媽拏油條吃得很快樂，嚼得很有味，連連稱讚數聲好吃。」她在臨死之前，再三交代兒子：「我不曉得日本話，死了以後，不可用日本和尚。」日本葬式，不拿炷香、不燒紙錢，部分禮儀不同於台灣的儀式。

吳濁流以「母親」的形象書寫，隱喻台灣主體性不容扭曲；先生媽捍衛台灣本土語言文化強悍而有實踐力。

四、錢新發作為隨從日本語言文化的代表

處於被日本殖民宰制下，台灣是沒有主權的，追隨日本語言文化、阿諛奉承日本政權的錢新發，即是喪失主權、追隨皇民化腳步的一般流俗的象徵。他處處以個人利益為考量，看輕下階層的鄉鄰，吝於施捨弱勢者；²⁰但是只要與他的名聲、他的事業有關，錢新發總能夠假意奉承、不惜捐款。他秉持著「知得時勢者，方為人上人」的信念，醫學院畢業後，「聘娶有錢人的小姐為妻，叨蒙妻舅們的援助，開了一個私立醫院。」開院時，又舉辦了盛大的開業祝宴，來宣傳他的醫術，這個宴會，博得當地人士的好感，收到意外的好成績。

皇民化運動開始，錢新發全家都說日本話，禁止使用台灣話，率先成為日本語家庭，更改日本姓名，對此他深感無上光榮，更從生活型態上全面過起日本式的生活。諸如穿和服，吃早餐的「味噌汁」，喫茶，插花，彈日本琴，唱日本歌謠，講究日本禮儀，改造房子為純日本式，設備新的榻榻米和紙門，浴間用日本風呂，買進日式黑檀茶櫥子等等。不僅錢新發及其太太、兒女如此，連醫院的護士、藥局生也要共襄盛舉。因此，當「剃頭的，補皮鞋的，吹笛賣藝的也改了姓名」，他感覺自己的上流身分被弄髒了，竟性急的破口罵出他自以為下流的台灣母語來：「下流十八等也改姓名」！

錢新發認為日本的語言及文化才是上流的，唯獨先生媽堅持說台灣母語、

²⁰小說提到錢新發認為：「給乞丐普通一杯米最多。」丫頭量米的時候如果給錢新發看見，一定要被他臭罵一頓。他罵人總是把人罵得無容身之地，那管他人的面子。而且總為了丫頭遵照先生媽的囑咐，而錢新發捨不得多施米，吵吵鬧鬧，對丫頭說了一篇大道理。

遵行台灣文化的傳統，這使得錢新發沒有法子，「徒自增加憂鬱」，「氣得沒話可說，只在心中痛苦」，「心中常常恐怕會因此失了社會的地位，丟了自己的面子，煩惱得很」，「沒有法子，只在暗中嘆氣。他一想起他的母親，心中被陰雲遮了一片」，「無意中想起母親的頑固來，惱得心酸」。

簡單來說，錢新發代表著追求「權勢」與「利益」的勢利社群，這種社群不管在什麼境地，毋庸置疑的會選擇追隨時代的流俗，皇民化運動開始，他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與權勢，自然而然積極地投入成為日本皇民的改造當中。然而，不管他怎樣過著日本文化的風雅生活，其結果越造成他自家的高傲、忘本，曾麗玉如此犀利的剖析：

吳濁流對台灣日治時期皇民化的質疑，一個不能認同自己本土文化與語文的人，即使接受了外來再怎麼「高雅」的文化，終將成為一種文飾假象，結果往往造成社會更加的分歧與對抗，其附帶的是本島人或日本人自我身分認同的曖昧與人性的扭曲。²¹

五、先生媽與錢新發的關係乃建立在文化認同的「父子之倫」上

儒家文化強調對長輩、尤其是對父母的孝順，在《論語》、《禮記》、《孝經》等經典經常提到，「孝順」更發展成對祖先的崇拜，進而使中國及其殖民地產生了對故土的留戀和民族的自豪感。

〈先生媽〉這部小說的錢新發對於他的母親，就是建立在孝順--「父子之倫」的文化認同上，而不是現實利害犬馬之養的關係上。

雖然，先生媽和丈夫做工支持兒子的醫學院學費，但是錢新發畢業之後，依靠的是妻舅的勢力，才能開設私立醫院、發展醫療事業。錢新發個性節儉吝嗇，卻持續奉養而且不敢違逆母親。先生媽有自己可以運用的私房錢；敢於杖打勢利、看不起窮人的醫生兒子；大聲教訓兒子為什麼教小孫子罵剃頭店下流；錢家成為日本語家庭後，只有先生媽滿口台灣話，還喜歡用台灣話跟客人應酬。當錢新發改姓名為金井新助，並建築純日本式的房子，全家人穿和服要照相作紀念，只有先生媽仍然穿台灣服，而且將她的和服砍斷，她說，穿上和服這樣的東西，將來沒有臉去見祖宗。

做為兒子的錢新發，對於母親的慷慨好施，敢怒不敢言；先生媽指責錢新

²¹同註 5，頁 32。

發忘記自己的父親做過什麼苦力，他唯唯諾諾；先生媽堅持台灣文化的一切，錢新發只能煩惱、嘆氣。小說敘述：

他的母親頑固得很，錢新發怎樣憔悴，怎麼侷促，也難改變他母親的性情。若要強行，一定受他母親打罵。不能使母親覺悟，就不能實現自己的主張。雖然如此，錢新發並不放棄自己的主張，在能實現的範圍內就來實現，不肯落人之後。

可見，只要錢新發認定先生媽是母親，在儒教文化圈裏，他就必須勵行身為人子的孝道，奉養是最基本的，其他還有「敬」、「順」、「無違」等等層面。²²關於這一點，錢新發孝順他的母親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延伸出來的祖先崇拜，更不在話下。在這樣的理解下，「先生媽」做為母親，進而延伸出「根本文化」，甚至是台灣在地的文化與情感的象徵內涵。畢竟，「油條」、「台灣衫褲」未必相同於原鄉的服飾或飲食。

理查·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書表明，文化傳承的過程，經過複製的觀念並不會與原來的觀念完全相同，因此產生變異，這些相似但是有所不同的觀念，在散佈時會互相競爭。²³從儒教文化對嫡親的孝敬，而不忘祖先故里，進而敬愛自己生長和作息的鄉土和社會，由敬鄉更進而產生了善鄰的觀念。

只要先生媽活著一天，隨從日本文化的錢新發還遵從儒教文化的孝道，根本文化與在地文化便經由這樣的關係延續下來。先生媽死後，兒子錢新發違反了母親的遺囑，改用日本和尚、日式葬禮，也就是說，「孝道」這樣的文化認同一旦消失了，其他的根土文化的連繫也將不再了。

六、結論

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沒有文化，就沒有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生活的總體，把每一民族的一切生活包括起來稱之為文化。²⁴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

²²《論語·學而第一》云：「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為政第二》云：「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又：「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²³Richard Dawkins (理查·道金斯)著，趙淑妙譯，《自私的基因》(台北市：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11章，頁287-306。

²⁴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79年)，頁13。

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廣義的文化包括文字、語言、建築、飲食、工具、技能、知識、習俗、藝術等，大致上可以用一個民族的生活形式來指稱它的文化。如果認為異民族的文字、語言、建築、飲食、工具、技能、知識、習俗、藝術取代原來民族的文字、語言、建築、飲食、工具、技能、知識、習俗、藝術只是單純的一種擴散或是涵化的方式，那麼，原有的文化消失了，也就失去一個民族的根，而容易被其他異民族操控、消滅或同化。

小說〈先生媽〉寫到先生媽臨死前向乞丐說出了對兒子的觀感：「有錢有什麼用？有兒子不必歡喜，大學畢業的也是個沒有用的東西。」我認為《論語·述而第七》的這段話最能曲盡吳濁流想要藉由「先生媽」此一母親的角色所要傳達的意涵：「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再有錢、有地位、有學歷，連自己的根、自己的文化都不要了，這有什麼用呢？

吳濁流對台灣文化貢獻至鉅，他不遺餘力發揚台灣文化，提攜台灣作家，在 37 歲以後創作了許多反映台灣歷史、政治與社會現象的小說。我想，他很可能有這樣的想法；根生於斯土，肯定自己是這塊土地相關權益的享有者與承擔者，愛惜並傳續根土文化的內涵，才能面對一波又一波外來力量的壓抑與挑戰。

如果只是用「錢」或「權」決定一切，台灣可以成為任何形式的被殖民者，而在不斷被決定的過程中，失去文化認同能力的台灣人最後可能成為永遠被操控、不被認同的邊緣人，什麼都可以、也什麼都不可以的邊緣人。

陳儀深在《台灣的社會；從移民社會、多元文化到土地認同》的結語說：「在從事文化活動之際，國人所已建立的的人生價值觀，更必須與土地認同緊密結合，否則那些由於人口流動與商業活動相互影響之下所造成的文化游離現象，所導致的冷漠與疏離，便很可能不利於文化的創造與生活的營造。」²⁵ 人口流動與商業活動尚且會造成對文化與生活的不利影響，更遑論其他國家或民族文化的涵化或擴散對國人人生價值觀的轉變改移！

我們可以揣想，經過中華帝國、荷蘭、日本、美國、蔣政府至今，根土文化的內涵，諸如最具體的飲食、服飾、宗教信仰、節慶的風俗習慣，甚至是對

²⁵同註 10，頁 110。

人的熱情與友善，在現今大部分台灣人的身上，還有多少的影響力。

參考文獻(以作者筆畫順序遞增排列)

專書

Richard Dawkins (理查·道金斯)著，趙淑妙譯，《自私的基因》(台北市：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

余昭玟，《從鍾肇政到葉石濤》(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2013年)

李筱峰、林呈蓉編著，《台灣史》(土城市：華立圖書公司，2007年)

范振乾，〈論吳濁流作品中的台灣人意識〉，收入林柏燕主編，《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專刊》(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2000年)

陳儀深，《台灣的社會：從移民社會、多元文化到土地認同》(淡水鎮：群策會李登輝學校，2004年)

彭瑞金編，《吳濁流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1年)

錢穆，《中國文化論叢》，收入《錢賓四全集 44》(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95年)

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79年)

期刊論文

張良澤，〈吳濁流的社會意識〉，《中外文學》，3卷9期(1975年2月)

張良澤，〈吳濁流的社會意識-下〉，《中外文學》，3卷10期(1975年3月)

曾麗玉，〈文化之認同與抵抗美學：以〈水滸〉、〈奔流〉、〈先生媽〉「母親」作為隱喻書寫為例〉，《中華科技大學學報》，71期(2017年7月)

張毅，〈雙性同體視角下吳濁流小說中的女性形象研究〉，《閩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104期(2017年1月)

邱雅芳，〈以母親之名--皇民化時期台灣男性作家作品的女性呈現〉(1937-1945)，《台灣文學學報》第三期(2002年12月)

黃仁姿，〈戰爭與糧食：二戰期間台灣糧食管理體制的建構〉(1939-1945)，《國史館館刊》，第52期(2017年6月)

學位論文

楊明慧，《台灣文學薪傳的一個案例--由吳濁流到鍾肇政.李喬》，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

盧欣怡，《吳濁流小說中的台灣社會》，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